

回顧人類學門近三年的發展(2007-2009)

黃樹民*



三年前我自美返國服務後未久，於2007年1月接任國科會人文處人類學門召集人時，許多學界前輩及友人立刻善意提醒：「國科會已多次建議裁撤人類學門，將它合併到社會學門中。你做為學門召集人，應注意這個趨向，不要成為本學科的千古罪人。」就在這種警鐘震耳的情形下，我接下了這個重擔，決心嘗試改變當前的困境。雖然沒有當烈士的氣概，但也做好挨罵的心理準備。

無可諱言，近十年來人類學在國內已是一門在走下坡，並逐漸被邊緣化的學門。雖然各大學和研究單位內相關的研究及教學人員數目持續增加，然而人類學做為一門專業知識，及其對現代人社會生活的潛在貢獻，已逐漸失去社會的肯定，甚至連人類學者也自我徬徨。最明顯的例子，就是國科會人類學門的專題研究申請案，在2006年時已僅餘35件。這與動輒上百件申請案的教育學門、管理學門等自然無法比較。但更根本的問題是：為什麼國內專業人類學者會缺乏研究的興趣與動力，不願意向國科會申請研究經費？這是否是因為學術行政結構上的問題，如缺少正確的申請訊息及管道？或缺少適當的獎勵制度，使得參與學者得不到預期的學術報酬，而喪失興趣？或懷疑審查過程不公，而使得學者裹足不前？還是因為學門本身的發展面臨困境，學者無法跳出自我設限的研究框架？

台灣人類學門邊緣化的另一個明顯例子，是傳統人類學研究領域的專長，如台灣原住民當代社會變遷研究、台灣轉型社會中多元文化的意義、人

*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



類生物性與文化的分界面、全球化中的本土文化如何對應發展等，都被其他非人類學學科如文化研究、大眾傳播媒體等學門所取代。這個現象促使我們去追究另一些問題。針對人類學本身，我們可以問：為什麼國內專業人類學者缺乏廣闊的研究視野與社會關懷，而將自己封鎖在象牙塔內，不願與其他學科對話，或者不處理當前快速社會變遷的議題？台灣的人類學者該如何開展新的研究方向與方法，以突破當前面臨的困境？從外部整體的學術及社會環境來看，人類學的邊緣化可能不僅只是本學科的問題，也可能凸顯我們當前社會習慣於快速、技術性的解釋及解決問題，以致無法接受人類學所強調的微觀、長期累積式的知識建構。

我無意深入討論台灣當前的學術與社會特性，僅能就現實面來定位人類學的角色，並思考台灣的人類學如何能突破現況。台灣學術受歐美影響至深，人類學自不例外。從國際學術大環境而言，歐美人類學界從 1980 年以來所流行的後現代主義、解構主義等，及其所持的反科學、反經驗主義的方法論，使得很多學者因批判現實的虛構性而畏懼任何的經驗建構，致使對現實社會的關懷難以開展，甚至貶抑具實務與時效性的研究工作。在此情形下，此一學科被社會邊緣化，實屬難免。

不過，我們回顧國際學術發展，在進入 21 世紀後，歐美人類學界的經驗主義研究方法又逐漸抬頭成爲主流。抽象空洞的論述已逐漸被學界質疑。因此，當全球化的浪潮，以無可抗拒之勢將台灣社會席捲其中時，如何提升社會參與能力，掌握世界人文思想發展潮流，並培養多元文化世界觀的人類學，已成爲台灣學術發展的一項重要需求。在此形勢下，如何重建一門能契合未來發展、教學與研究需要的人類學，作育台灣下一代兼具本土文化歷史理解與全球視野的公民，正是當前人類學急需推動的目標。同時爲能提升人類學者的社會參與，如何在制度上建立更公平、公開、透明化的參與平台及獎勵標準，更是本學門的當務之急。

冰凍三尺，非一日之寒，於是我在過去三年任內推動或加強了一些措施，均旨在提供人類學同仁進一步努力的機會，以及同儕學者對人類學的認識。主要的項目包括：(1) 定期邀集國內各主要人類學教研單位負責人集合會商，以研擬人類學各單位如何進行資源整合，增加互信，並具體推動人類學教研工作之發展。(2) 由於我同時擔任台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的理事長，爲重新凝聚人類學的社群意識，強化學會的職能，推動每年的大型年會，使

其成為不同世代學者、學生的學術論文發表與交流平台，增進學門的參與感。(3) 邀請不同的人類學教研單位輪流主辦學門相關的活動，如每年舉辦的人類學營或學會的年會、出版學會刊物《人類學視界》(新發行)等，打破由固定社群主導學術的迷思。(4) 針對人類學界新進人員及新生代，於 2008 年舉辦「人類學高等研習營」，邀請 7 位國際人類學期刊總編輯，對個別學員提供指導建議，以提升其在國際刊物發表的能力。

在這三年中，經由兩位人文處處長陳東升教授及廖炳惠教授的大力支持，人類學門的改造工程得以順利開展，並已逐漸呈現出新的面貌。例如，國科會人類學門專題研究申請案，已由 2006 年的 35 件成長為 2009 年的 55 件。台灣人類學與民族學會的會員數，已從 2006 年的 56 人增加到 2009 年的 200 多人。同時台灣人類學年會的參與人數，也由 2007 年第一次年會的 80 人增為 2008 年的 200 人，並在 2009 年與美國東亞人類學學會合辦的第三次年會中，更創下 400 多人齊聚一堂的記錄。誠然，我們不能期待這種跳躍式的增長會永遠持續下去。我僅能說，台灣人類學已走入新的發展方向，重新展現活力。

台灣社會正面臨一個青黃不接的尷尬轉型期。剛自威權主義陰影下脫蛹而出的公民，易成為極端主義者挑逗、收編的對象。如何提倡多元文化的社會生活，培養包容、尊重異己的價值觀，都是人類學知識得以發揮之處。另外，我們的社會應對知識的生產有合理的耐心與尊重。身為學術行政主事者的我們，也應努力營造合理、公平、有活力的學術環境，培養下一代有社會責任感、並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研究人員，這是我們這一代人類學者期待達成的目標。